

历史认识对象的特点

王正平

历史研究过程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认识者与认识对象、主体与客体之间,存在着矛盾。探索客体的特点,并能得到近乎实际的理解,对解决认识过程中主客体之间的矛盾,会有裨益。

关于什么是历史认识对象,国内学者有不同理解。有的认为指的是历史学研究对象,即客观存在的历史。有的认为是指自历史学发生以来,众多历史学家对认识对象不同看法的演变发展过程,属史学史的范畴。我则倾向于前者。了解历史认识对象的特点,乃是探讨历史认识论的第一步。

(一)历史是过去的客观存在,是以往人类社会发生、发展过程,不会重现,不能重演。即使在特殊条件下会出现一些类似重复的现象,也绝不完全同样。正如早期西方殖民者在美洲建立的奴隶制庄园,不能与古代罗马的拉提芬丁同日而语一样。

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识开始于作为主体的人们直接接触被认识的客体,获得感性认识,再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个过程循环往复以至无穷,使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不断深化,乃是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历史认识中的主客体关系,却与此有些不同,主体不能直接接触客体,诸如观察、实验、解剖都无法进行,更谈不上实践于(生活于)其间。主体对不会重现的历史现象,要认识它既不能越过感性认识阶段,那就必须使之“重现”。确切地说,至少使主体在思维过程中,能感受到某些历史现象的“恢复”。不会重现的客体又要在主体思维过程中力求使之“重现”,是历史认识过程所特具的一个难点。

要获得对历史的认识,只有依靠史料为中介。

一般认为文字史料,一切古代和外国的东西,在古人和外国人是直接经验,就现代我们这些人来说,则为间接经验。事实并非一概如此。例如,司马迁写《史记》,除拥有大量书籍、档案、文献材料等前人记录外,还从见闻和游历中得到许多材料。其

中有一些属于“所闻”的东西：“闻项羽亦重瞳子”，“吾闻冯王孙曰：‘赵王迁，其母倡也，嬖于悼襄王。……’”这里司马迁说得明明白白，那是听来的，并不是他直接经验。至于他亲自到各地走访调查，精神可嘉，获得的材料补充了文献史料的不足，但除自然形势一些部分外，很难说是直接经验。被誉为西方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曾坦率地表白说：我的原则是不管人们告诉我什么，我都把它记录下来。他有时确实严肃认真地这样做了，例如他记述了一个眼睛达十年的盲目国王，因接受神的劝告，用贞妇的尿洗眼而复明的事迹。类似这样的记载连间接经验也说不上，其所依凭的只是一些道听途说或神话而已。

司马迁写《史记》，终于汉武帝时。希罗多德几乎是与希波战争同时代的人物。可见，即使是当代人撰写的当代史，也会因种种主客观原因，并不能全面如实地反映客体。历史上许多被传颂的写当代史的史学名家，他们也无非是在某个特定事件上，从主观上努力求真而近真罢了。其所用材料，大部分属于从别人那里探知的间接经验。当代西方有人提倡“历史学家应根据他们的直接经验来写历史”，愿望虽好，实难不打折扣地做到。因为天下之大，史事之繁，个人经历仅是沧海一粟而已。那些亲历其事、亲临其境者，往往受到个人所处地位、观察角度、认识水平等限制，其所记情况，比较难达到与客观实际相符。

文字史料是前人经历与传闻的记录，或是前人所能见到的史籍、档案的编纂。那些撰述者或记叙者，由于接触面的大小、主观的好恶、着眼点的差异、认识和表达能力的高下，对同一事物会有不同的评述。过去漫长的岁月里，对史实的记叙、撰述、保存、传播的工作，几乎都掌握在统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手中，所述史事，的确存在着时代与阶级烙印。再由于编纂史籍者所属的阶层、集团的不同，所记史实往往出入很大。鄙视人民，成王败寇，党同伐异，讳亲讳尊，乃是常事。不过，对此不能一概而论。例如，被这些史籍作者称之为“盗”、为“匪”的固然有很多是起义暴动的劳动人民，但也有一些是打家劫舍致使无论贫富均难免遭受荼毒的真正匪徒。再如，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之时，一些为民族捐躯的人物，被史书如实尊称为英雄豪杰，那些卖国求荣者被贬为叛徒奸贼，亦是符合实际的。至于一些史籍所记载的生产工具的改进，生产经验的积累，科学技术的进步，文字语言的发展，天象的变异，自然灾害的发生等等，一般更属珍贵史料。如若认为这些内容也一概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记载，那就不对头了。

至于实物史料，对不同时代的社会生产、生活制度、阶级构成、宗教信仰等，较之文献史料，可提供较接近的感性知识来源，比较容易使我们感受到所属时代社会面貌的某些形象。不过，也要考虑到即使我们亲临某些农村遗址，用当时的生产工具操作，会感受到这些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设施的原始落后，不便使用，领会到当时人们为生存而搏斗的艰辛，但在如何播种、施肥、耕耘、管理的过程中，往往难免夹杂有

现代人的知识经验。特别对操作后会有什么收获,其关心程度与当时的人们是不相同的,因为我们只是在“演习”,并不靠这些收获物为生;用就地发掘出来的饮食器具做餐的,仍是现时的人;对历史生活的体验,与前人的素质、观念、欲求、所处环境等,有着难于相等的差异。发掘所得实物,如马王堆出土的素纱禅衣,刘胜夫妇墓中的金缕玉衣等,只是从某一侧面反映了我国当时手工匠人的聪明才智和剥削者的穷奢极欲,而不能等同于当时的手工业发展水平。所以,观察了遗址、遗物,不经过考古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考察任务就难于完成,更谈不上得到完全确切的感性认识。在观察分析出土实物时,稍有疏忽或带有主观臆测,往往会得出错误的判断。例如,1957年从西安市灞桥砖瓦厂掘出的古墓中发现西汉时代的用纸——“灞桥西汉纸”的信息,一度轰动国内外。现经轻工业部造纸工业局与中国造纸学会纸史委员会的调查、检验认定,当时所得的一团纤维状物仅是一些废旧麻絮、绳头等破碎纤维的堆积物,其中没有发现造纸时所要经历的切断、打浆、抄造等基本工序的痕迹。所谓“灞桥纸”,只是一团废麻絮。在二十世纪,纠正这样一条以讹传讹的信息,几乎经历了卅年,何况要纠正几百几千年前的不准确记载。这一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历史认识离不开史料。文字史料有部分在我们是间接经验,在前人是直接经验;有相当大的部分在前人也是间接经验,只是更早的前人的直接经验。这是由于人不能事事直接实践。历史认识主要靠间接知识,可以说是历史认识对象不会重现的特性所决定的。

只有比较真实地反映过去情况的史料,才可能成为历史认识的中介。史料的搜集是必要的,对史料的核实、考证与辨伪更是必要的。还必需尽可能占有比较详细的、典型的史料。

尽可能详细地占有可信的史料,是认识历史的起点。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恩格斯说过:“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①在科学的历史观指导下,通过对史料的分析研究,找出其内在联系,才能一步步“重现”一些历史现象。

(二)历史认识的客体属于过去的客观存在,是不会变化的,而主体的认识能力和依凭的条件,却处于不断提高和变化之中。不再会变动的客体,是历史认识对象的另一特性。

有些学者不同意这个观点。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我国史学界就有人提出:“我对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②他们所谓的“变化”,实际上是史料的发掘与考订。这种说法把客观存在的过去几乎等同于史料学,从另一角度说,也混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585页。

② 《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73页。

滑了过去的史家(即主体)根据其对客体的认识程度写出不同水平的历史著作,即历史学的发展变化与过去的历史(即客体)的关系。

社会历史发展过程是自始自终的矛盾运动,但必须承认作为过去的历史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它不会因为岁月流逝而改变其那时那地的实际情况。过去的历史是确定的,无可变换的,无论你喜欢不喜欢,你研究不研究,甚至你知道不知道,它们总是已发生过的客观存在,不会再增一分,减一毫。

至于主体的认识能力和所依凭的材料、条件,却是会变化的。这是历史科学之树所以常青的有利条件。造成主体认识能力变化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①即使马克思主义确立之后,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能力,仍是在实践中不断增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建唯物史观的过程里,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有个发展充实过程: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及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对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历史继承性和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在理论上未作充分论述,乃至被一些人攻击为经济史观。这一点,恩格斯在晚年已有所发觉,并进行了补述。轻视和忽视理论思维,就不可能对历史原貌产生新的认识。

(2)由于天灾人祸等种种原因,使历史文献遭到无法补救的浩劫;因保管不善而佚失残缺;因屡经传抄,造成文字的讹、衍、缺、夺;因编纂者的立场、观点、方法问题,记叙详略不当;热衷于颂扬“圣功”“王道”,不记述有关劳动人民生活生产的情况和缺少具体数据;出于某种目的,伪造文籍、史书及法令,等等。这些情况都给“重现”历史原貌,带来重重困难。克服这些困难,剥去掩盖真相的外衣,从砂里淘出真金,才能使历史认识对象一步步恢复原状。

(3)也存在若干有利于历史认识深入的条件:许多史料、史籍重新发现,文物考古工作取得新的进展,史学信息大大丰富,为人们深一层认识历史增加了方便。例如,近年山西襄汾县城东“夏墟”——陶寺遗址考古的新发现,为研究我国文明的起源提供了可信的重要资料。西安出土的原始甲骨文,比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要早1200多年。许多地区旧石器、新石器遗址的发现,把远古时期中华民族先人的活动区域大大扩展。内蒙古哲里木盟十余座辽墓的发掘,获得了许多文物,其中的壁画,形象逼真,反映了辽代社会生活的部分风貌,起到了图解辽史和弥补史籍缺漏的作用。这些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60页。

都有利于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新史料的发现,并没有改变历史认识对象,只是有利于更进一步认识它的原状。

历史认识对象永不会变与不断提高的主体认识能力之间,构成历史认识过程的一对特殊矛盾。这是历史认识对象的另一特点。

据此,提高主体的认识能力,特别是提高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的修养,在历史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历史学自从产生以来,一般来说,后人总是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前进,经过世代努力,积累了丰富的史学遗产。八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仅要吸取一百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精华,也要批判地继承二、三千年来唯心史观史学的遗产。

我们的历史学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排除僵化,提倡百家争鸣,要从理论、方法论及具体研究成果方面,注意国内外科技发展和史学动态,从而提高我们的认识能力。

(三)作为认识对象的客体,历史不会重演,也不会改变,是客观存在。但从当时当地来说,任何地区的历史,又是会变的,都是不断发展着、运动着的。历史不能割断,历史发展是不间断的、连续的,在间断中又有阶段性可分。

历史认识对象是一个连续向前发展的过程。推动历史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除了经济关系这一基本因素之外,还有上层建筑、阶级关系、社会意识、自然条件,以及外部环境(包括国际形势)等,对历史进程发生加速或延缓的影响。由于各种因素作用的时间、程度不同,以及互相交叉作用的影响,使历史的发展变异纷纭,丰富多采。

自从国家出现的时刻开始,它总是通过不同形式的政体、机构、政策、法令、法律、监狱、军队等手段,来缓和社会矛盾,使之不损害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巩固其统治。关于国家与社会经济关系,关于国家政权的反作用,恩格斯在1892年指出过。他说:“一切政府,甚至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只不过是本国状况所产生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来执行;它们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结果,可是最终它们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①

在人类文明史中,存在着阶级对抗,这是矛盾斗争的一种特殊表现。阶级社会中主要对立的两个阶级,奴隶主和奴隶,封建主和农民,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这种依存与矛盾关系,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既相适应又相矛盾情况的体现。它们的演变,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其中,

① 《致尼·弗·丹尼尔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5页。

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既有剥削压迫与被剥削压迫的斗争的一面，又有互相依存、互相联结的一面。统治阶级内部各集团、阶层之间，不仅有利害一致性，也存在利害冲突。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不会自动对社会发展发生作用，要通过人们的实践活动，其内容包括自然斗争，社会斗争和思想意识的斗争。

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众多有意识的社会人群，由于阶级、阶层、集团的利害，社会地位、所受教育、生长条件、受传统习俗及宗教影响的差别，无论是矛盾缓和的安定时期或矛盾激化的动荡时期，众多由个人组成的人群，各有各的要求和愿望。各种希望、想法出现在这个时代、这些人身上，而不会出现在另一时代和另一些人身上，不是偶然的，而是受客观条件制约的。最典型的例子，是我国春秋战国之际诸子百家的纷纷登台和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历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生、发展与西欧封建社会向下坡走有关。各阶级、阶层人们面临社会危机的接近，对罗马教廷、对封建领主分裂势力的不满，蓄积已久，终由分散的点点星火，发展成文艺复兴运动。各阶级、阶层、集团（自耕农、依附农、地主、城市贫民、市民以及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等）的代表人物，分别借着希腊罗马与原始基督教的亡灵，指斥时弊，提出理想或解除危机、缓和危机的主张。于是自意大利开始，出现了类似我国历史上“百家争鸣”的局面，对那时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影响。对思想意识作用的认识，要尽量做到实事求是。当那遥远的古代，有多少人想往能比肉眼看得更远，但不能达到目的，乃有“千里眼”等神话人物出现。到了伽利略那个时候，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才有望望远镜的问世。可见，那些超越生产力水平的愿望，不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那种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需要的愿望才会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忽视一定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而强调人们思想的魅力，把一切历史都认做是思想史的观点是令人难以苟同的。我们在五、六十年代之间，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及人们的觉悟程度，急于求成，想要快步进入共产主义，其结果是大家所知道的。反之，一概抹煞思想意识的反作用的观点，也是荒谬的。

其他作用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因素尚多，它们发生作用的情况与程度，因时因地而异，这里不再一一详述。

历史就是这样连续地不间断地向前发展着，从不中断，但依据哪种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和哪个阶级掌握国家权力，宏观地说，可把阶级社会历史分为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不同阶段。某一社会还可分为形成、繁荣（上升）和衰落、崩解（下降）阶段。封建社会建立前后，进行封建剥削的地主，是进步力量，而到了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之时，他们就成为阻碍力量。又因各地区发展存在差异，不同地区的国家，其社会形态的转变情况也要具体分析。二十世纪初年，西方资产阶级已趋向没落反动，而其他一些国家，资产阶级却在领导着民主革命。直到当代，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

一般说来,还不能划入反动阵营。

这种连续不断又分阶段性和地区性构成的历史认识对象,十分复杂。每一个社会发展阶段,每一个阶级,都有它存在的理由。当历史要向更高级阶段发展时,它又属暂时的,必然要走向衰落的。这就形成我们的认识对象的具体性、连续性与阶段性,以特定的时间、地点与条件体现出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历史认识过程中的关键所在。

作用于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历史运动发展的因素,不是单一的,不能用经济、阶级斗争、上层建筑、思想意识、个人作用及人们需要等等中的任何一种因素作为唯一因素来认识历史、解释历史。同时,它们的推动作用,也不是不分主次的“多因素”的,如果把各种因素起的作用等量齐观,那必然会陷入“因素论”的错误。正确的方法应是在认定“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的发展”的基本前提下,看到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虽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但它们之间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对历史的发展发生影响。根据历史认识对象具有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有着丰富多采的变异性这一特性,我们在认识历史过程中,要坚持全方位的思维,不能单向思维,要坚持多方位、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

(四)历史是一个继承、扬弃和发展的过程。历史是有意识的人们在一定环境中,在既有事实的基础上进行创造和发展的。世界的今天由昨天演变而来,又必然走向未来。古是今的基础,今是古的发展,其间含有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新社会中往往保留旧社会的陈迹,在继承和扬弃中创造发展。

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每一代人都是在前一代已经取得的生产力水平上向前发展,因此就形成了人类的历史联系。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生产关系,就会有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就会有一定的国家等上层建筑,也就是说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形态。每一社会形态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的矛盾,构成社会的基本矛盾,并与这一社会的存在相始终。当该社会处于形成上升阶段,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既相适应,又相矛盾,以适应一面占主导地位。到了不适应一面占主导地位时,该社会就趋向下坡,为了不致丧失已得的果实,就会发生社会剧变,人们改变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与旧上层建筑,用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上层建筑来为生产力发展开辟道路。因此,就形成了人类历史在社会基本矛盾的演变发展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状态。

这种矛盾运动,也贯穿于每个社会形态的始终。在阶级社会里,只要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还未走到尽头,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统治集团中较有远见的开明人士,以及那些不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在形势压

力之下，会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某些改革。被改革和扬弃的往往是旧社会的残余，以及明显地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那些部分。这种改革会遭到种种阻力，如若有所成效，会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文化的发展，某种思潮的形成情况，也是这样。西欧中世纪文化中有希腊罗马奴隶制文化因素。文艺复兴思潮里含有古代文化的痕迹更是明显。以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而言，在他们所描绘的蓝图里，或明或暗地含有从古代希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的《财神》、《公民大会上的妇女》和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吸取来的原素；当然也有早期基督教和“异端”对天国的向往；更有千百年来农民、城市贫民在生活和斗争实践中，期望平均主义世界来临的思想源流。当然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所向往的，较之古代的、原始基督教的想法，究竟是前进多了。

我们考察的对象——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史、法制史、经济发展史、交通史、货币史、教育史、思想史都能从后代历史中发现一些早先已经有过的、前代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东西，其中有些是糟粕，有些是精华，两者并存。人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淘汰旧的不合时宜的陈腐，发扬前人实践中形成的好的经验，作出开拓性的创造。

历史发展如此，史学发展同样如此。历史事物，即使是历史上同一事例，同一人物在当时与后世的地位、作用、影响，前人与后人的评述，并不总是一致的。秦汉的长城与今日长城的作用，大不相同。对它的评价，有人认为是中原文化的维护物，有人说是游牧部落与农业部落的分界线，有人认为它是民族融合的障碍，有人认为是人类的杰作，也有人别有用心地说长城是中国北部边界。褒贬之间，悬殊极甚。隋朝开通南北的运河，在唐宋元明，在今天，所起的作用和对它的评价也千差万别。上述历史认识对象作为客体，早已是客观存在。那些对客体的评述，虽属意识形态范畴，但一经传诵、撰述或付梓流行，也属客观存在，是受当时社会经济环境，阶级利益等制约的客观存在。它会使我们从“太史公曰”，“臣光曰”、“异史氏曰”中看到史学长河里的不同阶段的流向动态。虽然，严格说来，这是史学史的任务，但它既属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实，当然也就可纳入历史认识对象范畴。并且我们可以先驱们已达到的水平为基础，批判地继承利用他们世代代积累起来的认识成就，进入新的境界。这样，过去史家对历史事物的认识，反过来又为人们认识这个历史对象提供条件，借以吸取认识正确的部分，修正错失，减少迷误。昔日的主体一变而成为客体。这样看法，符合了解过去的主体对客体的认识程度和今天对客体认识的要求，以及意识形态的相互继承性、相对独立性的事实。

无论是历史遗产，以及成为其中一部分的史学遗产的扬弃、继承和创新，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人们进行活动的结果。诸如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及上层建筑思想意识的演变中，都含有人们的活动。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中，大大小小的社会变革过程中，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过程中，统统具有不同于自然科学认识对象这

一特点。许多单个人的意志有差距、有矛盾,它们之间的冲突、靠近与汇聚,才形成反映时代趋向的力量。那些具备适应时代要求条件的人物,在适宜的气氛里,会发挥比常人更大的作用。千千万万的单个意志并非不可捉摸,它反映了大势所趋,人心向背,归根到底受制于社会基本矛盾,它的影响又反作用于社会基本矛盾。

(五)作为客体的人类历史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各民族、各地区、各国的文化发展,有各自不同的色彩和特性,又有它们的共同点。

人类社会的氏族部落阶段,活动范围较小。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活动范围不断扩延,经济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其地域也随之更为广远。古代文明地区的历史发展,一个个部落融合为民族,并不断与周沿民族发生经济文化交流。曾经在古代印度地区生活的,有达罗毗荼人、雅利安人,后来又有希腊人、波斯人、突厥人、阿拉伯人和蒙古人先后参加进来,他们共同创造了有本身特色的印度文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经过中国人长期的消化改造,近二千年来,对中国社会发展发生深刻的影响,渗透到中国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降至近古,已成为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其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色。当佛教在印度趋向衰落的十一—十二世纪之时,中国佛教仍兴盛不衰。不仅中印两国佛教徒的互访,促进了相互间的文化交流,而中国的另一些近邻各国,也从中国输入了佛教。隋唐之时,日本学问僧来中国学习佛经者,络绎不绝,中国的文物制度随之源源传入日本。佛教在日本广泛流播,并渐次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众多宗派,使佛教在日本日趋大众化,尤以镰仓时代为甚。同佛教一样,基督教、伊斯兰教在传播中,亦形成许多派别,为各地区民族所吸收融化,影响着各国的政治文化,并保有各自的特色。

各民族在科学技术上,亦在互相传授中得到发展。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外传与反馈,就是一个典型事例。中国的雕版印刷术、胶泥活字印刷术传入朝鲜后,被吸收融化,于十三世纪中叶形成了金属活字印刷术,转而传入中国。中国于十四世纪初,使用木活字和锡活字印刷术,后来又传到朝鲜。我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经阿拉伯传入欧洲,几经转折,德人谷腾堡(1394(?)—1468年)于1450年左右制成铅合金活字,后来随着机械制造的进步,到了近代,西方的机械造纸及印刷又反传到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地方,加速了各国的文化传布。印度人创造的“○”的符号和十进位制,经阿拉伯人改造后传入欧洲,再由欧洲人传布到包括印度在内的全球各地,成为世界性的通用数字。在农作物品种和手工业原料作物方面,这种交流例子,更举不胜举。没有长期的这种交流、融合,很难设想全世界人民的衣着与食物,会有今天这样具有各国特色的繁多品类花样。

中国的文化是我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在创造和互相吸收影响中,各民族都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世界上大小各民族,都共同参与世界文化的创造,又各自保

持各民族的特色，在语言文字、民族素质、历史传统、民族心理、生活习惯、社会风尚等方面更为显著。这些特色，会因历史的发展、民族传统的继承，以及吸收融合外来文化程度不同，更加绚丽缤纷。与此同时，由于世界范围内文化交流的发展，有些民族间的差别，也会在融合的长过程中，逐渐被磨损碾碎。

据此，主体在认识客体的过程中必须要有纵横联系与比较。专攻中国史者，需要世界史知识的武装，从事世界史研究或外国史研究者，也要懂得中国的历史。研究断代史者，不但要知道前朝与后代，也要了解当时世界各国特别是四邻的情况。在科学知识的广度与深度上，努力充实自己，是提高主体认识能力的必要条件。我国的史学工作者，必须科学地处理好文化的继承与交流，既要重视发掘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又要有选择地及时吸收外国先进文化的成果。反对闭关固陋，盲目排外，也反对崇洋自卑，全盘吸收，亦步亦趋地模仿他人。

（责任编辑：张亦工）

〔作者王正平，1921年生，杭州大学历史系教授。〕